

温朔彬 温端政 著

汉语语汇研究史

HANYU YUHUI YANJIU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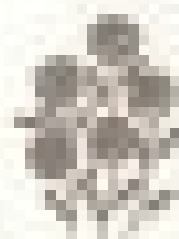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袁同义 邵敬敏 著

汉语语汇研究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01)



商务印书馆

汉语语汇研究史

温朔彬 温端政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汇研究史/温朔彬,温端政著.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711-9

I. 汉… II. ①温…②温… III. 词汇—汉语
史—研究 IV. H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57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ANYŮ YŪHUÌ YANJIŪSHĪ

汉语语汇研究史

温朔彬 温端政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711-9

2009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为收条对象的语汇类辞书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字典、词典、语典“三足鼎立”的局面。语典的兴起,大大促进了语汇研究。语汇学作为与词汇学相平行的学科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

汉语语汇学虽然是一门新的学科,但汉语语汇研究却由来已久。如果把收集整理语汇也看作是语汇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从东汉末年崔寔辑录的《农家谚》开始,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其后,北魏·贾思勰(约465—约532年)撰的《齐民要术》,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过程中,引用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谚语。到了唐代中叶,李商隐(约813—约856年)的《义山杂纂》可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保存比较完整的收集整理语汇的集子,其中有许多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歇后语和谚语。宋代王君玉的《杂纂续》和苏轼的《杂纂二续》,以及后来的《杂纂三续》(明·黄允交撰)、《杂纂新续》(清·韦光猷撰)、《广杂纂》(清·顾铁卿撰)、《纂得确》(清·石成金)等,构成了“杂纂”的系列性工程。宋代还有《常谈》(吴箕撰)、《释常谈》(无名氏撰)和《续释常谈》(龚颐正撰)的“常谈”系列。

到了明清,语汇的收集整理进入了鼎盛时期,许多著作不仅收条丰富,而且注重考源,有的还加简单注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明代杨慎(1488—1559)的《古今谚》，清代翟灏(1736—1788)的《通俗编》、钱大昕(1728—1804)的《恒言录》和杜文澜(1815—1881)的《古谚谚》等。进入20世纪以后，不仅有《俗语典》(胡朴安等编，上海广义书局1922年出版)、《通俗常言疏证》(孙锦标著，1925年江苏南通县翰墨林石印)等带有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出版，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语汇研究论著问世。其中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第2卷第2、3、4期，1921)和白启明的《采集歌谣所宜兼收的——歇后语》(《歌谣月刊》第44号，1924)，可谓开启用新的语言学观点研究汉语谚语和歇后语的先河。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语汇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全面系统地考察汉语语汇研究的历史，总结汉语语汇研究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语汇研究的经验，对于提高我们对汉语语汇的认识，促进语汇研究，把汉语语汇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语”往往被看成是“词的等价物”，处在词汇的附属地位。一些研究词汇史的论著也涉及语(多被称为“熟语”)。如周荐的《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1995)，在第二部分“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和第四部分“走向繁荣时期”都讲到“熟语”研究的情况。许威汉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2000)下编，在第六章“‘五四’后(1920—)的初步探讨”、第八章“新中国成立后(1960—)的具体探讨(二)”、第十章“‘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步伐(1978—)”和第十一章“新时期的拓展与深化(1990年前后)”里，都设有专节讲“熟语”研究。周荐与杨世铁合著的《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的做法有所不同,新中国建立以前按时代发展叙述,新中国建立以后,现代汉语词汇学、古代汉语词汇学分别叙述,“熟语”则单列章节叙述。还有,武占坤的《汉语熟语通论》(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修订版,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和王勤的《汉语熟语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都设专章讲“熟语”研究的历史。这些著作关于“熟语”研究历史的论述,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够系统或者不够全面的缺陷,但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温端政、周荐合撰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00)一书,是研究汉语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俗成语)研究历史的专著。该书虽未涉及汉语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雅成语,而且时间段限于20世纪,但论述比较系统,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汉语语汇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建立起汉语语汇研究史的新体系,力求展示汉语语汇研究的丰富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不足,以期对汉语语汇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研究历史,通常是要分期的。根据汉语语汇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采用“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繁荣期”一类的分法,而是划分时间段进行叙述。古代部分,设立专章概述。现代部分分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世纪50—6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各立专章,后一个阶段内容比较丰富,分为上、中、下三章。叙述内容以介绍论著为主,语汇类辞书(或资料性的工具书)除了古代部分和20世纪初期的《俗语典》(胡朴安等编)、《通俗常言疏证》(孙锦标著)外,暂不涉及。在介绍论著时,有的加了一些评语。这些评语不是对有关

论著的全面评论,而是就某方面发表一些看法,限于水平,难免不够全面或有失偏颇,诚盼读者多加批评指正,以便有机会再版时改正。就资料收集来说,由于汉语语汇研究文献十分丰富,采缀难尽,缺漏之处在所难免,特别是限于篇幅,许多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著未能予以介绍,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另外,限于篇幅和资料,海外研究汉语语汇的情况也未能涉及。

本书前五章由温朔彬执笔,其中评语(用楷体表示)和“小结”由温端政撰写;第六章由温端政执笔。全书由温端政通稿。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乔永先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出版部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山西师范大学翟维琦、辛菊教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吴建生研究员通读了全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9年3月20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我国古代语汇研究概况	(1)
第二章 20 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汇研究	(19)
第一节 谚语研究	(19)
第二节 歇后语研究	(35)
第三节 成语研究	(51)
第四节 俗语研究	(54)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50—60 年代)的语汇研究	(58)
第一节 谚语研究	(58)
第二节 歇后语研究	(65)
第三节 成语研究	(78)
第四节 惯用语研究	(88)
第五节 语的综合性研究(“熟语”研究)	(91)
第四章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汇研究(上)	(98)
第一节 谚语研究	(98)
第二节 歇后语研究	(125)
第五章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汇研究(中)	(163)
第一节 成语研究	(163)
第二节 惯用语研究	(195)

第六章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汇研究(下).....	(225)
第一节 俗语研究.....	(225)
第二节 语的综合研究(上):作为词汇组成部分的 “熟语”研究.....	(245)
第三节 语的综合研究(下):在“语词分立”基础上 的语汇研究.....	(269)
后记	(283)

第一章 我国古代语汇研究概况

语作为一种语言单位早就存在于汉语里,先秦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

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礼记·文王世子》)

语曰:“流丸止于瓯臿,流言止于智者。”(《荀子·大略》)

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杨朱》)

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韩非子·备内》)

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弇之也。(《尸子》卷上)

齐语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孟子·梁惠王上》)

古语曰:“不知,无害于君子;知之,无损于小人。”(《尹文子·大道上》)

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墨子·非攻》)

“语”前也可加上“鄙”、“野”、“里”、“俗”,作“鄙语”、“野语”、“里语”、“俗语”。如:

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

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庄子·刻意》)

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汉书·

刘辅传》)

俗语曰：“时无赭，浇黄土。”（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卷六）

古代，“语”与“谚”相通。如：

官之奇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穀梁传·僖公二年》）

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僖公五年》）

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语，谚言也。”

“谚”同“语”一样，前面也可以加上“鄙”、“野”，作“鄙谚”、“野谚”。如：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些事实说明，先秦文献里就含有相当数量的语汇。但是收集整理语汇的著作却出现较晚。通常认为最早的是《通俗文》，相传是东汉服虔所撰。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认为该书开“通俗词典的先河”，“是一部解释通俗用语的词典”（中华书局，1983，第51—53页），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认为该书“是一部搜罗最富解释最精的俗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6，第231页）。该书已佚，从后来的引文来看，该书所收罗和解释是字词，而不是语。如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八曾引《通俗文》“木四方为棱，八棱为枅”；“烧骨以漆曰垸”。《太平御览》三四六卷引《通俗文》“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六〇五卷引《通俗文》“方絮曰纸”。还有像“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

‘床’”，等。这都表明《通俗文》是一本“俗字典”。（见王勤《汉语熟语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83页）

相传另一东汉人崔寔曾撰《农家谚》，其中收有“舶掉风云起，早魃深欢喜”、“二月昏，参星夕，杏花盛，桑叶白”、“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水涨潭；云行北，好晒麦”、“富何卒？耕水窟；贫何卒？亦耕水窟”、“麻黄种麦，麦黄种麻”、“布谷鸣，收小蒜”等农谚和气象谚（见清刊本《说郛》），该书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收集整理农谚和气象谚的著作。

唐宋时期，市井文学地位逐步提高，语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受到重视。唐代李义山的《杂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分上下两卷，收歇后语和谚语。

所收的歇后语，以后一部分作为纲目，然后列举前一部分的不同说法。如：

必不来：穷措大唤妓女、醉客逃席、把棒呼狗、客作偷物去、追王侯家人

不相称：先生不甚识字、贫斥使人、穷波斯、不解饮弟子、瘦人相扑、社长乘凉轿、瘦杂职、病医人、老翁入倡家、屠家看经、肥大新妇

不得已：忍病吃酒、掩意打儿女、大暑赴会、汗流行礼、为妻打骂爱宠、忍痛著灸、为人梳头、穷寺院待客、被势位牵率

用现代人的习惯，第一组可以变换为“穷措大唤妓女——必不来”、“醉客逃席——必不来”、“把棒呼狗——必不来”、“客作偷物去——必不来”、“追王侯家人——必不来”等。其余类推。

所收的谚语都分为两个部分，把后一部分作为纲目。如：

须贫：家有懒妇、早卧晚起、作债追陪、养子不及父、狼藉

米谷、仓库不检点、抛散饮食、庄园不收拾、多输爱赌、谩藏住不堪物、弃业逐乐、物贵争买、遮盖家间作为事

必富：勤求俭用、见艺广学、不迷酒色、不取债负、不嫌粗辣、爱惜家事衣服、耕种酝造及时、婢妾解机织、钱物出入有簿历、计算买卖不失时、及时收藏、检束家计不作践

如果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看，便带有传授知识的性质，如“家有懒妇须贫”、“勤求俭用必富”等，都比较明显地属于谚语。

继李义山《杂纂》之后，宋代有王君玉的《杂纂续》、苏轼的《杂纂二续》，明代有黄允交的《杂纂三续》，清代有韦光猷的《杂纂新续》、顾铁卿的《广杂纂》、石成金的《纂得确》等，都沿用了李义山《杂纂》的体例。

宋代除了《杂纂》系列著作之外，有吴箕的《常谈》一卷，主要讲典故逸事。还有无名氏的《释常谈》三卷，该书共收 125 条，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语”。有的只释义，不说来源；有的先释义，然后援引书证或典故。如：

风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谓之风马牛。

胶柱鼓瑟 不见机而守旧规者，谓之胶柱鼓瑟。《史记》：“赵有名将赵奢，能用兵。奢既死，赵王怜之，使其子括将兵拒秦。蔺相如谏曰：‘大王以其父能而用其子者，如胶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远矣。必败大王之事。’王不听。为秦将白起坑赵军十万。”

该书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此后又有龚颐正的《续释常谈》和无名氏的《别释常谈》等书，所收都是词、语夹杂。

宋代真正算得上语汇专集的，是周守忠所撰《古今谚》一卷。该书前面有作者自序，称：“略以所披之编，采摘古今俗语，又得近

时常语，虽鄙俚之词，亦有激谕之理。漫录成集，名《古今谚》。古谚多本史传，今谚则鄙俚者多矣。”

明代在收集、考释语汇方面有新的进展，影响较大的有杨慎的《古今谚》、陈士元的《俚言解》，以及无名氏的《目前集》等。其中以杨慎的《古今谚》最具代表性。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著述甚多，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古今谚》是他收集整理谚语的著作。书中收集的谚语都是从古籍中辑录下来的。如：

《列子·杨朱篇》引古语：“生相怜，死相捐。”

《鬼谷子》引古语：“女爱不蔽席，男欢不尽轮。”《战国策》：“宠女不蔽席，宠臣不蔽轩。”

清代在语汇的收集和考释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批带有辞书性的语汇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是《通俗编》、《恒言录》、《恒言广证》、《迩言》、《谈徵》、《释谚》、《语窠》、《常语寻源》、《古谣谚》等。

1. 《通俗编》

作者翟灏(1736—1788)，字大川，晚年改字晴江，浙江仁和(今余杭县)人。本书刊行于乾隆十六年(1751)，共三十八卷，按内容分为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诵、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兽类、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杂字、故事、识余，共38类。约收5000条，其中属于语的约1500条。取材范围包括经传子史、诗文词曲、小说、字

书、诗话、艺谈、佛经、道书等，非常广泛。每个条目都引书证，追溯语源，或考其流变。如：

老牛舐犊 《后汉书·杨彪传》：“愧无日殚先见之明，独怀老牛舐犊之爱。”《权德舆诗》：“老牛还舐犊，凡鸟亦将雏。”

朝不保夕 《左传·昭元年》：“赵孟曰：‘吾侪偷食，朝不保夕。’”又《僖七年、襄十六年、三十一年》俱曰“朝不及夕”。《国语》：“王闾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设脯糗以羞之。”《晋书·李密陈情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按，《传灯录》云，早起不审夜，俚语云，朝不保暮，皆因之小变。

《通俗编》对汉语语汇的语源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认为该书“取材范围相当广泛”，“条目和资料非常丰富，为同类著作之首”。同时，也指出该书的主要缺点：引用文献常随意删节或出处不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564页）除此之外，收录的对象较杂，有字，有词，有语；许多条目只引用文献，不释义，或释义不全面，还有的条目分类不当，不便检索等，也是不足之处。

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通俗编》时，后面附有梁同书撰写的《直言补证》。梁同书（1723—1815），浙江钱塘人，与翟灏同一个时代。曾编有《直语类录》一书，辑后看到翟氏《通俗编》内容更为丰富，于是不刊行原书，改写为《直言补证》，作为《通俗编》的补充。《直言补证》辑录《通俗编》所未收的词语，如清代有个常用谚语“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通俗编》未收，《直言补证》收了此条，而且引用元·李治《敬斋古今黄主》卷五：“俗谚有之：‘小儿欲得安，无过饥与寒。’”说明其由来。《直言补证》共收414条，没有分类，也是有词有语，引出书证，没有释义。

2. 《恒言录》

作者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是清代著名的音韵、文字、训诂学家。恒言,即常言,全书六卷,共收 800 多条,分为 19 类:吉语类、人身类、交际类、毁誉类(以上卷一),常语类、单字类、叠字类(以上卷二),亲属称谓类(卷三),仕宦类、选举类、法禁类、货财类(以上卷四),俗仪类、居处器用类、饮食衣饰类(以上卷五),文翰类、方术类、成语类、俗谚有出(以上卷六)。1958 年商务印书馆重校排印本书时,称该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1) 搜集了不少双声词、叠韵词,可供研究汉语音韵学参考。

(2) 作者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语言,所搜语汇、成语、俗语和谚语很多还活在今天人民群众的语言里。作者并能从古籍中考证其所自出及相沿的习惯说法,也有助于汉语语源学的研究。

(3) 书中罗列的复词或词组,具有各种结构方式。例如:单纯结构式的“傀儡”,联合结构式的“福寿”,主从结构式的“好汉”,主谓结构式的“汗擗”,动宾结构式的“得意”,附加结构式的“老子”,重叠结构式的“万万”,可供研究构词法者作为参考资料。

(4) 搜集了一些词素颠倒的等义词或近义词,词素类似的同义词,包括等义词、近义词,都能引经据典地加以考证,足供研究汉语词义辨析参考。

《恒言录》较《通俗编》晚出,体例更为严谨,取材更精审,分类更合理。在引证的翔实方面也超过《通俗编》。(参看《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 570 页)